

张光直著

#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张光直作品系列

3  
2



张光直作品系列

#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张光直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张光直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999. 9

(张光直作品系列)

ISBN 7-108-01294-4

I. 中… II. 张… III. 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746 号

责任编辑 杜 非

封面设计 海 洋

版式设计 徐 方

---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4.125 字数 315 千字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图字 01-1999-2630

---

ISBN 7-108-01294-4/K·283

定价 23.80 元

1999.11.16

考古书店

# 前 言

这本书所收的 19 篇论文,是我从 1950 年加入考古行列四十多年以来用中文所写的文章里面,除去已经收入《中国青铜时代》(第一、二集)的以外,慎重选择出来的。最早的一篇发表于 1957 年,此后有 1959、1960 年各一篇,1977 年的两篇,其余的都是近几年所写的。我所写的考古学专著,都是用英文写的。我自 1955 年就一直住在美国,自然要用英文写书,在期刊中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一样。但在这 40 年中,我一直没有与中国的考古学、人类学界失去联系。70 年代以前,我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民族学研究所的集刊上发表了不少中文写的论文。自 80 年代,大陆上的几个学术刊物登载我的考古文字。我用中文写的论文,是我和国内的同行学者交流学习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我也可以说是国内学术界的参与者,我的著作在国内考古学的发展上,也可能起过作用。所以这本论文集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也可以算是一段记录。另外我还用中文写过许多综合性的考古论文,因为新材料和新研究,已经完全过时了,就没有收入本书。

不过,我还是收进来一篇过时的文章,它已经完全不能代表我今日的看法了。这就是第四篇,发表于 1959 年的《中国新石

器时代文化断代》。在这以前,中国考古学者相信在新石器时代有两个平行的文化,仰韶在西,龙山在东。50年代,有河南陕县庙底沟的发掘,在遗址上层发现了一个新的文化,就叫做庙底沟二期文化,似乎是从仰韶到龙山的转变期的一种文化。1959年,安志敏和石兴邦两位先生在北京出版的《文物参考资料》10月号上面,我在台北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上,共发表了3篇文章,不约而同地提出来一个内容很是相似的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关系的新解释,即华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最早起源于豫西、晋南和陕西关中地区,然后发展成为龙山文化,向东扩展到山东和沿海地带。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个新石器文化发展史的理论。那时大陆和台湾之间还没有接触,所以这三篇文章不谋而合地达到同样的结论,可说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巧事。不久,大陆上发生大跃进、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的运动,考古工作中断,这个所谓“核心地区起源说”的理论,在国内外便一直是嗣后十余年内的主流理论。到了70年代的中期,由于碳素14数据逐渐发布,使我们知道核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并不比“边缘”地区为早,同时大汶口文化的地位在山东确定了下来,证明虽然河南的龙山文化可能是从仰韶文化发展出来的,山东龙山文化的祖先却可以在大汶口文化里找到。这样一来,核心地区起源说很快地便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被“区域文化多元说”所取代。这篇文章今天虽然已经不再适用,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收入本书,使读者看看在三十多年以前,考古学者在当时所知道的材料的基础之上,考虑了什么问题,用了些什么方法,怎样得到这个在考古界称雄一时的结论。本书里没有收入有关区域文化多元说新理论的文章,因为我对这新说还没有用中文写过,但从第七篇论文《中国

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中,读者可以看到我较近的看法。

其他的十几篇论文当然也有时代的限制。例如《“浊大计划”第一期考古工作总结》里面所讨论的台湾中部史前文化的序列,今天不用说已有更新的材料,必须加以补充。但这篇文章的意义是跟着浊大计划的历史性而来的。关于浊大计划的历史意义,还没有人详细地讨论过。我有一篇叫做《追记台湾“浊大计划”》,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一书中,读者可以参阅。

有关三代考古的文章,都已收入《中国青铜时代》(第一、二集)。

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给李济之先生身后在大陆上第一次出版的学术著作所写的《编者后记》,也是我对李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的讨论的一个尝试。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之父,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建树详细讨论的文章,还很少见。我希望这篇跋语在这里发表,能够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因为李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上所做的事太多了,还需要有人做进一步的研究。

# 目 录

前 言 .....	1
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	1
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 .....	10
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 .....	31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 .....	45
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 .....	115
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 .....	136
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 .....	151
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 .....	190
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 .....	206
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 .....	227
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 .....	259
“浊大计划”与 1972 至 1974 年浊大流域考古调查 .....	279
浊水溪大肚河流域考古——“浊大计划”	
第一期考古工作总结 .....	312
圆山出土的一颗人齿 .....	350
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 .....	357
古代贸易研究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 .....	370
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 .....	384
殷墟五号墓与殷墟考古上的盘庚、小辛、小乙时代问题 .....	401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 .....	417

# 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sup>①</sup>

在“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这一个大题目的下面来讨论考古学，我们至少要牵涉到三个小题目：（1）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建设上有没有考古学的地位？（2）如果考古学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占有一席之地的话，有没有“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3）考古学的建设是不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上面能够做出重要的或甚至是独特的贡献？这篇文章里我就这三个小问题直抒己见。

## 一、人类学与考古学之间的关系

把考古学放在人类学里面去的这种作法，是美国的习惯。美国考古学上有句名言，说“美洲的考古学便是人类学，不然它便什么都不是”。这种看法是适合美洲考古学的现实的。美洲的人类虽然至少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但除了中美的玛雅文明以外都没有文字记录，而且即使玛雅的文字记录所包括的范围也只限于历法的记录与片段的王朝历史。西方文明自 1492 年哥

---

<sup>①</sup> 原载陈国强主编《建设中国人类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



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便逐渐进入美洲,美洲的土著文化逐渐缩减,但直到今天美洲土著文化还是活的文化,是人类学者研究的对象,所以研究美洲考古的学者便不能不从人类学者研究的结果与资料出发。

旧世界文明史研究的情况与美洲大不相同,所以人类学、考古学这些学科在学术分类系统中的地位也就大不一样。首先,旧大陆的考古学是在历史科学的温床里产生出来的。爱琴海古典文明的考古,是19世纪后期德国人谢里曼根据荷马的史诗在特洛伊奠基的,而中北欧的最初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是19世纪后期的地质学家在地质层位里辨认出来的。在中国,考古学的传统基础是建立在金石学上的,而金石学一向是史学的一个分枝。

旧世界人类学的产生,不论是体质人类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或称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都是与西方文明的工业革命(18世纪中叶),与继之而产生的全世界的殖民活动分不开的。当西方工业文明伸展到亚、非及大洋洲与拉丁美洲时便与土著民族接触,当即强烈意识到其人种上与文化社会上的分歧性,而人种学与民族学又成了学术上与行政上的需要,因而促成了这些学科在19世纪的发展。这些学科传入中国也是在欧洲通过翻译开始的。据芮逸夫的记述<sup>①</sup>:“最早的一部书是德国人写的《民族学》,其书出版于1898年。两年后,英国人洛伊将其译成英文,称为《文化人类学》。我国的林纾和魏易二人又将其从英文译成汉文,称为《民种学》,并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由北

<sup>①</sup> 芮逸夫《民族学在中国》,《大陆杂志》3卷7期,203—206页,及3卷8期,251—255页,1951。

京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官书局出版发行。但同年满清政府学部订颁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在文科大学各门学科‘中外地理门’主课中,则将其称为‘人种及人类学’。”

既然旧世界学科系统中考古学与人类学来自不同的渊源,那是不是就说在人类学的讨论当中应当没有考古学的地位呢?学科的分只不过代表我们对学术界内一种分类系统的认识,它是有时代性的,因为学科的分类系统是经常变化着的。20世纪初期在中国属于历史学范畴的考古学并不是不可在20世纪的末期独立起来或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的,这主要得看从事考古学的人对自己学科的新了解、新认识与新的分类。但是在这些问题上,从业者必须做一番细心的检讨。讨论的焦点应当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考古学与人类学(在这里当指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密切结合起来对考古学有什么益处?对人类学又有什么益处?

因为人类学家能够观察和分析现代的活的社会,它能够把社会当做一个系统性的有机体来研究,能够了解这个有机体各组成部分间的联系,甚至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性的,它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类型,所以人类学所分析出来的人类社会的有机系统性的构架也有种种不同的类型。换言之,人类学供给我们人类社会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各种不同的蓝图。受过人类学训练的考古学者在这两点上要比没有受过人类学训练的考古学者占有优势的地位:第一,他很自然地把考古资料当做“人”的活动遗迹来看而不仅只当做器物本身来看。第二,他知道要把考古遗物拼合起来从而复原古代文化社会,而其中哪些蓝图是可供参考的。后面这点有时会有人误以为用考古的资料去凑合人类学的理论,其实这是一种根本的误

解。用考古资料来复原古史,我们最终的依据还是资料本身,而绝不能把某种人类学的理论奉为教条,拿资料去凑合。但我们对人类社会各种蓝图的了解,可以在我们复原历史时从已知的各种模式中得到启发。近年来甚至有考古学者专门研究现代民族中器物的形态和行为,并把其作为考古复原的参考,我们称这种研究为“民族考古学”。

反过来看,人类学者所观察研究的现代文化与社会,是历史的产物,对它们的了解需要相当的时间深度。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研究现代原始社会的学者,在这方面有无所适从的苦恼。因为从一方面来说,作为他们研究对象的原始社会都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的,所以他们只好使用各种拟测的方式,根据神话传说来将他们的历史加以复原;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又意识到这样复原、拟测出来的历史是缺乏客观基础的。迄今为止,社会人类学者对历史的态度,对研究原始民族的历史的方法,还一直处于犹豫不定的状态中。但是不论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在实践上社会人类学者在对过去的社会的研究上,在绝大多数情形之下是有历史资料的,这就包括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如中国社会)中的历史资料与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如大部分的美洲土著社会、大洋洲社会、非洲大部分社会)的考古资料。即使在有文字记载的社会中,他们的历史也可以因考古资料而加强和延伸。换言之,考古学是供给人类学从事历史研究的重要工具,甚至是主要工具。

根据上面简短的讨论,我们可以对文首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回答,那就是说在“具有中国特色(或任何特色)的人类学”的建设上,是可以有考古学一席之地的。固然在中国传统学科的分类上,考古学与人类学有不同的来源,在当代建设

中国人类学的设想之中,依我们的拙见,是应当把考古学放在一起来讨论的。

## 二、中国考古学的特点

如上面所说,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渊源是中国传统上的史学以及作为传统史学附庸的金石学。要了解现代中国考古学的特点便不能不自传统史学的特征说起。中国传统史学史是一门博大的学问,我自己不是学它的,在短短的几段文字里更不能将其精髓摘要说明,因此只能列举下面这几条公认的特征。第一,中国传统的史学所治的材料限于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之内。第二,传统史学资料的采取是个案式的,以历史人物的传记为主。第三,传统的史学重视人物的褒贬,所谓“春秋大义”。(《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之中,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第四,传统的史学因为有春秋大义,所以是供今人治世参考的,可谓“古为今用”。(《史记》卷6《始皇本纪》:“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①

① 杜维运《比较史学与世界史学》,载《史学评论》1979年第1期,25—39页。

从传统史学到当代中国考古学中间相接的桥梁是宋代以来的金石学与1928年到1937年的殷墟发掘。宋代吕大临自述他作《考古图》(1092)的目的,是“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刘敞《先秦古器记》中也说:“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能尽之。”这两位北宋金石器的大师笔下,金石学便是史学的附庸,而王国维认为宋代学者对中国考古学实有开创之功,蔡元培在《安阳发掘报告》的序中也说:“我们现在做考古学的同志,不可忽略这个光荣的历史。”<sup>①</sup> 安阳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肇始,它在把考古学维持在中国史学传统之内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代科学考古学固然是由西方的科学家输入的,而中国本部最早发掘的考古遗址是周口店和仰韶村,但中国考古学家自己主持和做大规模、长期发掘的遗址却是殷墟(1928年)。如果中国考古学家在周口店或仰韶或其他史前遗址最早进行大规模、长期的发掘的话,以后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很可能会走相当不同的道路,它可能会从历史学的范围中走出来,而与自然科学做比较密切的结合。但殷墟是历史时代的遗址,殷墟最初的发掘是由对甲骨文的寻求而促成的,而甲骨文的研究更是文献史学的延伸。李济在他总结殷墟发掘成果的一篇文章<sup>②</sup>里说,殷墟发掘造成中国史学界革命性的变化,但他所指的变化主要指“地下材料”的增加,而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在“累集的史料”。李济列举殷墟发掘的价值如下:(1)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实性及其在中国文字学上的地位;(2)将史前史的

① 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0,63—79页。

② 李济《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9)40,913—944页。

资料与中国古史的资料连结起来；(3)对于殷商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做了一个丰富而具体的说明；(4)把中国文化与同时的其他文化中心做了初步的连结，证明中国最早的历史文化不是一种孤独的发展，而实在是承袭了若干来自不同方向的不同传统，表现了一种综合性的创造能力。这几点都很富见地，但他忘了说明殷墟发掘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考古学的传统。这是李济偶然的忽略，还是殷墟发掘在方法体系上仍然脱不开传统史学的窠臼，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上面的讨论令人想到中国当代考古学界中所讨论的“中国学派”的问题。这个说法是1981年苏秉琦最先提出来的。据俞伟超和张忠培的综合，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包括下面这三个特点：(1)“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考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手段，仔细观察与分析考古现象所呈现的矛盾，具体地研究中国境内各种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内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2)“在科学发掘的基础上，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种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研究……中国……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3)“这种研究是以揭示历史本身面貌作为自己的惟一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sup>①</sup>。仔细咀嚼这几点的涵义，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中国考古学的精髓是沿着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一贯下来的：以中国为对象，以新的春秋大义为目标，以文化个案为基本资料，以对现代群众的教育为目的。

<sup>①</sup> 俞伟超、张忠培《探索与追求》，载《文物》1984年第1期，1—9页。

### 三、考古学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可能贡献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考古学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一支,它的主要功能是重建史前史并且辅助文献史料重建古代史。根据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资料,我们可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程序与动力,并且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社会的内容,也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底层。由于中国文明的古老与连续性,这些中国史前史与历史发展的资料是极其丰富的,在世界史学界里占很大的分量。

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是产生在对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的基础上的。西方人类学家最初研究的对象是没有文字历史或罕有文献资料的亚、非、大洋洲与拉丁美洲的原始社会,所以西方人类学(与社会科学一样)的理论和方法论,一般来说,是有点忽略了历史深度的。这一点我上面已经提到过,去年我在为陈其南所著的《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一书所做的一篇小序中,曾对这一点做过下列的论述:

社会人类学自从在西方诞生以来,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没有文字和历史记载的社会,因此它所发展出来的一些有关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系统和研究方法,都基于所研究的对象没有信史这一前提。数十年来,社会人类学者把西方这一套方法和理论介绍到中国来,但一直都还没有机会处理如何将这些理论和方法与一个有悠长文字记载的历史社会相结合问题。向来研究汉人社会(尤其是台湾汉人社会)的中外人类学家都以当代的社会现状为研究对象,而很

少想到如何将台湾汉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与台湾史研究结合起来,以及结合起来以后这种研究对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可能有的新的贡献。实际上有不少人已逐渐意识到,目前在整个社会人类学的领域之内要做崭新的、有创造性的贡献,惟一的机会,是如何针对像中国这样有历史时间深度的社会,利用其文献资料来研究文化社会变迁的问题。把社会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则对彼此都会有所启发的<sup>①</sup>。

这里所说的“历史研究”当然包括考古学的研究在内。事实上,从考古学研究上所看到的中国文明起源的程序与动力已经在社会科学上对文明国家起源的一般理论有很鲜明的启示了<sup>②</sup>。把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中国史学研究作为验证与创造一般理论的一个基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一条大路。

---

① 陈其南《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台北:允晨公司,1987,4—5页。

② 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载《九州》,1986,1—8页。



# 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sup>①</sup>

作为一种通过物质遗存对过去所做的系统调查,中国的考古学和它所研究的文明一样古老。不过,传统上它仅仅是中国历史学的附庸。近代以来,田野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始从西方传入中国。最近这些年,新的考古发掘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新材料,它们正迅速地改变着中国的历史面貌。但是,尽管有着这样新的科学的背景而且声誉日隆,考古学在中国却依然是历史学的一种工具,纵使作为工具,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中国的历史学似乎是独立于中国历史之外的一个实体:它不因改朝换代而稍有终止。正如余英时所说的那样,“中国文学史具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源远流长,一是史学传统一脉相承,不因政治社会的变迁而中断”。<sup>②</sup> 不过,历史学不断地从新的技术,新的理论和方法中取得营养。其中的一些技术和方法便是通过考古学的途径而来。以考古学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标志:一个是完成于公元 1092 年的吕大临的《考古图》,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古器物学的开始;再一个是 1920 年中国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确认,它揭开了中国科学考古研究的序幕。

---

① 译自: *World Archaeology*, Volume 13, No.2 (October 1981)。(陈星灿译)

②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172 页。